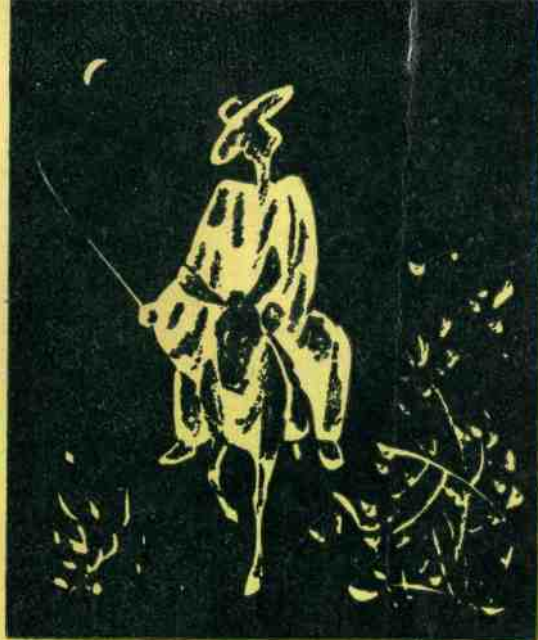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朝鲜学——韩国学丛书

韩国诗话研究

主编

郑判龙

副主编

任范松

姜孟山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朝鲜学—韩国学丛书(三)

韩国诗话研究

主 编 郑判龙

副主编 任范松 姜孟山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1997. 延吉

责任编辑：金秉活

封面设计：金胜铉

责任校对：张宏飞

韩国诗话研究

主编 郑判龙 副主编 任范松 姜孟山

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）

延边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：11.5

字数：281 千字

印数：1-500

1997 年 5 月第 1 版

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634-0928-9/I·75

定价：22.00 元

朝鲜学—韩国学丛书
编委会

顾 问	季羨林	
主 编	郑判龙	
副主编	任范松 姜孟山	
编 委	(依姓氏笔划为序)	
	朱七星	任范松 李东旭
	李得春	吴绍钊 金柄珉
	郑判龙	姜孟山 崔洪彬
	韦旭昇	

目 录

韩国诗话的特性·····	〔韩国〕赵钟业(1)
韩国古典诗论的民族性·····	〔韩国〕李炳汉(22)
朝鲜古代诗学总说·····	张伯伟(46)
论“言外之意”的诗歌世界·····	〔韩国〕郑大林(59)
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之比较·····	蔡镇楚(73)
朝鲜诗话对中国诗话的借鉴·····	韦旭昇(95)
韩国古典诗话对杜甫之批评·····	王克平(105)
崔孤云的文学观·····	〔韩国〕金周汉(123)
《白云小说》诗论刍议·····	金东勋(145)
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的审美批评·····	邹志远、刘雅杰(160)
崔滋的主气论·····	李海山(180)
“味”——高丽时期重要诗学范畴初探·····	温兆海(194)
论《东人诗话》的创作思想·····	马金科(227)
由《芝峰类说》看李睟光的杜甫诗论研究·····	〔韩国〕全英兰(238)
试谈许筠、李睟光诗论中的实学精神·····	孙德彪、暴刚(256)
《星湖僊说》诗论初探·····	任范松(278)
试谈李 穰的文学思想·····	李岩(293)
李德懋的“通变论”诗学思想·····	徐东日(306)
申纬的《东人论诗绝句》·····	〔韩国〕孙八洲(316)
附录:韩国历代诗话目录·····	(352)
后记·····	(359)

韩国诗话的特性

〔韩国〕 赵钟业

一、前言

在古代，人们把对诗歌的批评称之为“诗话”。换言之，诗话就相当于现在的诗论。但是，严格地说，二者又并非完全相同。因此，现代人对诗话所下的定义也互有不同之处。

此外，由于每个国家诗话的存在状态也有一些不同之处，所以，诗话还具有古今的时代差异。同时，随着国家的不同，它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地域性的差异。如果存在地域性的差异，它又必然会具有地域性的特性。也就是说，由于国与国的情况不同，韩国的诗话必然会不同于中国和日本的诗话。同样，中国的诗话也必然不同于日本的诗话。因此，本文旨在通过比较，考察韩国诗话与中国、日本有何不同之处。

对于这个问题，笔者曾在不同的文章中几次论及过。^①对于关心这一问题的人来说，这已不是什么新的话题。本文将在前几篇文章部分论及的基础上，进一步补充一些新的观点，对这个问题做综合性的论述。

① 拙文：《韩国诗话资料的考察》（忠南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《论文集》第LX卷第2号，1982.2）

《诗话之定义》（大田：语文研究，第12辑，1983.12）

《韩国古代诗论史》（太学社，1984.2）

《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》（台北：学海出版社，1984.2）

二、诗话的一般性质

由于诗话不是专门的诗歌批评,而是更多地具有随笔和稗说的性质,所以,就诗话的一般性质而言,它还有很多模糊不清之处。人们在诗话中,可以借助闲淡的资料随心所欲地论诗,也可以论及文辞。很多时候,还可以在论诗的过程中谈论事物。反之,在谈论事物或文辞的时候,也许又会论诗。

因此,最先提出“诗话”这一名称的欧阳修说:“居士退居汝阴,而集以资闲谈也。”^①

章学诚在《文史通议》中说道:

“诗话之体,原同随笔一样。论事则泛述闻见,论辞则杂举隽语,不过没有说部之荒诞与笔记之冗杂而已。所以仅仅论诗及辞者,诗格诗法之属是也,仅仅论诗及事者,诗序本事诗之属是也。诗话中间,则论诗可以及辞,也可以及事,而且更可以辞中及事,事中及辞,这是宋人诗话与唐人论诗著之分别”^②

在这里,章学诚指出唐宋诗话具有不同之处,即宋代诗话具有论诗、论辞和论事混杂在一起的性质。由于我国诗话受到了宋代诗话的直接影响,所以,它自然而然地具有宋代诗话的性质。

由于宋代诗话具有这种混杂的性质,而且有的诗话在评诗时,也不单独地冠以“诗话”之名,而是混杂在一般的杂著类书籍之中,所以,后人常常从中选择相关的内容,汇编在一起,称之为“××诗话”。郭绍虞在《宋诗话考序》中这样说道:

① 《六一诗话》小引。

② 见该书内篇五《诗话》条。

“以现尚流传者上卷，其部分流传，或本无其书而由他人纂辑成之者为中卷。至于有其名而无其书，或知其目而佚其文，又或有佚文而未及辑者，则概入下卷。上下卷均略以时序，不复分类。中卷则分撰述与纂辑二类，亦仍各以时序。”^①

由于上下二卷的是以原来的状态收录的，所以郭绍虞先生没有论及。他又把中卷分为两部分，即部分流传的为中卷之上，他人纂辑的为中卷之下，然后予以收录。

从郭绍虞汇编的中卷之下中所收录的情况来看，共收录了从《玉壶诗话》到《弁阳诗话》等二十一种诗话。这些都是由他人纂辑的。例如，《玉壶诗话》出自《玉壶清话》，《东坡诗话》出自《东坡志林》，《容斋诗话》出自《容斋随笔》，《老学庵诗话》出自《老学庵笔记》，《清邃阁论诗》和《晦庵诗话》出自朱子的文集大全，《浩然斋诗话》出自《浩然斋雅谈》等等。这些诗话都不是由本人撰写的，而是由后人汇编而成的。

此外，据推测，《古今诗话》（广文书局本）中收录的诗话，有许多已经更改了原来的题名。通过查看其目录，可以发现：卷一中的《许彦周诗话》、《严沧浪诗话》、《刘贡父诗话》等，都是统一的五个字的题名，而且其中不包括了作者的姓、字或号；卷二中的《竹坡老人诗话》、《临汉隐居诗话》、《六一居士诗话》和《苕溪渔隐诗话》等，本来取四个字的题名就可以，却非要凑成六个字的题名；卷三和卷四中的《珊瑚诗话》、《碧溪诗话》和《东坡诗话》等则取四个字的题名；卷七中的《诗式》、《诗谱》、《诗谈》、《诗论》等则取两个字的题名。因为更换题名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，所以题名的长短并没有多大关系。甚至把《象村软谈》改为《象村诗话》或《象村小说》，把《清江琐语》改为《清江小说》或《清江丛话》，也不会成为什么问题。之

^① 郭绍虞自序，台北，学海出版社，1980年版。

所以出现这种现象,是因为诗话本身原来就属于一种闲谈式的随笔,人们在看诗话时,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、改编,更换题名自然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。

在编辑者可以任意改题的情况下,中国的很多诗话,是从一般的杂著中汇编而成,并以“诗话”来命名的。但是,我国的情况与中国有所不同。洪万宗在编纂《诗话丛林》时,尽管也是从杂著中的汇编诗话,可是除了《清江诗话》、《惺叟诗话》和《霁湖诗话》以外,其他的都用杂著原来的名称标记。另外,根据情况,有不少本来就是诗话或诗评,可是从名称上却显示不出来。例如,李晔光在《芝峰类说》中,从卷九的文章部二开始到卷十四的文章部七为止,论述了“诗、诗法、诗评、御制诗、古乐府、古诗、唐诗、五代诗、宋诗、元诗、明诗和东诗”。在“旁流诗”到“诗芝”中,他从十多个方面论及了所有的诗话。此外,他还把《壶谷漫笔》收录在卷三的“诗评”和“诗话”之中。洪万宗尽管将自己的作品取名为《诗话丛林》,可是在收录时,却没有在原著上加上“诗法、诗评、诗话”等名称,仍然沿用《芝峰类说》、《壶谷漫笔》的名称。这不免让人感到有些遗憾。

洪万宗在许多著述中,都把重点放在诗话上,他在抄录诗话时,似乎只重视对诗话的笔削与夺,而对标题和名称则不太关心。他在《诗话丛林》的《凡例》中有这样一段话:

南壶谷诗话初多误录处 (例第4)

诸公所撰诗话,裒而合之 (例第5)

栢谷、水村、玄湖三诗话,俱录 (例第7)

他在收录时,没有使用《壶谷漫笔》、《终南丛志》、《水村漫录》、《玄湖琐谈》等原名,而是改为《壶谷诗话》、《栢谷诗话》、《水村诗话》、《玄湖诗话》,可是在目录中他又使用了原来的名称。我们推测,他这样做,是因为他认为诗话源于闲谈的资料,所以题名问题

无关紧要。

但是，诗话不全是无意义的闲谈资料。对于这个问题，郭绍虞先生有过一段论述：

诗话内容既兼有论诗及辞、论诗及事二种，所以它的性质，也与纯粹论辞论事者不同。诗格诗法一类之书，其内容尽管如何荒唐，但其撰述宗旨，却是严正的。……因此，由诗话之性质言，又介于此二者之间。在轻松的笔调中，不妨蕴藏着重要的诗论；在严正的批评之下，却多少带些诙谐的成分。这是一般撰著诗话者所共有的态度。^①

这就是说，诗话不仅在闲谈中包含有重要的诗论，而且在严肃的批评中还富有谐谑性。

从外表上看，似乎有些闲适散漫，而不够严密，但里面却包含有神秘的诗论和严肃的批评，这就是东方诗话学的一大特点。换句话说，东方人尽管在内心里对某一事物持否定态度，但外表上却常常显露出温和的神色。因此，才会出现诗评中有论辞、论事，论辞、论事中有诗话（诗评）这种现象。

三、诗话的定义

诗话的性质、诗话的资料和诗话书籍的名称都有上述特点。可是，近来却出现了不少只以表面上的名称来限定诗话定义的现象。那么，“诗话”到底是什么呢？毋庸赘言，诗话就是对诗的批评。现在，人们把诗评称为“诗论”，可是古代却称之为“诗话”。严格地说，“诗论”和“诗话”并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。因为从本质上说，批

^① 郭绍虞：《宋诗话辑佚》序，第2～3页。

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即有解释批评、欣赏批评(印象批评,即主观批评)、判断批评(客观批评)等方面的区别。古代的所谓“诗话”是一个广义的概念。于是,从诗的品第、诗格、诗法开始,到对诗的解释和有关诗的故事,都属于诗话所包括的范围。关于这个问题,许彦周认为:

“诗话者,辨句法,备古今,记盛德,录异事,正讹误也。若夫含讥讽,著过恶,诮疵缪,皆所不取。”^①

黄澈认为:

“平居无事,得以文章为娱,时阅古今诗集以自遣适。故凡心声所府,有诚于君亲,厚于兄弟朋友,嗟念于黎元休戚,及近讽谏而辅名教者,与予平日旧游所经历者,辄妄意铺留,疏之窗壁间。未几,抄录成书,而以罾溪诗话名之。至于嘲风雪,弄草木,而无与于比兴者,皆略之。”^②

他又说:

“时取古人诗卷,聊以自娱,因笔论其当否,且疏用事之隐晦者,以备遗忘,日往月来,不觉成编。”(同上)

可是,黄永思却认为:

“诗话杂说,行于世者多矣,往往徒资笑谈之乐,鲜无益于

① 许彦周:《许彦周诗话》自序。

② 黄澈:《罾溪诗话》自序。

后学。”^①

上述几种说法认为，诗话从闲谈和记事开始，有助于教化，论述了当否，或者记录了盛德和怪异之事。诗话的本质本来就大致如此，只不过这些说法论述得更详细些罢了。黄永思则指出，杂说和异事对教育无益。高丽的李世璜认为：

“我本朝境接蓬瀛，自古号为神仙之国，其钟灵毓秀，间生五百，现美于中国者，崔学士孤云唱之于前，朴参政寅亮和之于后，而名儒韵释，工于题咏，声驰异域者，代有之矣。如吾辈等，苟不收录传于后世，则堙没不传。决无疑矣。遂收拾中外题咏可为法者，编而次之为三卷，名曰‘破闲’。”^②

明朝的文璧认为：

“诗话必具史笔，宋人之过论也。玄辞冷语，用以博见闻，资谈笑而已，奚史哉？所贵是书，正在识见耳。若拾录阙遗，商订古义，不为无裨正史，而雅非作者之意矣。”^③

王铎则认为：

“近世所传诗话，杂出曼辞，殊不强人意，惟严沧浪诗谈，深得诗家三昧，关中既梓行之。是编乃今少师大学士西涯李先生公余随笔，藏之家笥，未尝出以示人，铎得而录焉，其间立论皆先生所独得，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，先生之诗独步斯世，若

① 黄澈：《碧溪诗话》跋。

② 李仁老：《破闲集》的李世璜跋文。

③ 《南豪居士诗话》序。

杜之在唐，苏之在宋，虞伯生之在元，集诸家之长而大成之，如其评鹭折衷，故老吏断律，无不曲当，人在堂上，方能辨堂下人曲直。”^①

上述几种说法，都以随笔来代称诗话。可见，诗话就是一种随笔。

但是，上述几种说法都仅仅从某一方面进行论述。有的论述得很有道理，有的则有些牵强附会，而且各种说法之间也不一致。我们认为，章实斋的论述最为具体，他是这样说的：

“诗话之源，本于钟嵘诗品，然考之经传，如云‘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？’；又云‘未之思也，何远之有？’，此论诗而及事也；又如‘吉甫作诵，穆如清风’，‘其诗孔硕，其风肆好。’，此论诗而及辞也。事有是非，辞有工拙，触类旁通，启发实多。江河始于滥觞，后世诗话家言，虽曰本于钟嵘，要其流别滋繁，不可一端尽矣。”^②

他又说：

“唐人诗话，初本论诗；自孟坚本事诗出，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。而好事者踵而广之，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；或诠释名物，则诗语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；或泛述开见，则诗语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。虽书旨不一其端，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，推作者之志，期于诗教有益已矣。”（同上）

他又进一步论述：

① 王铎：《麓堂诗话》序。

② 见上，《文史通议》诗话条。

“诗品·文心专门著述，自非学富才优，为之不易，故降而为诗话，沿流忘源，为诗话者不复知著作之初意矣；犹之训诂与子史专家，为之不易，故降而为说部，沿流忘源，为说部者不复知专家之初意也。诗话说部之末流，纠纷而不可犁别，学术不明，而人心风俗或因之而受其蔽矣。……论文考艺，溯源流别，不易知也，好名之习，作诗话以党伐同异，而尽人可能也。以不能名家之学，入趋风好名之习，快人尽可能之笔，著惟意所欲之言，可忧也，可危也。”（同上）

综上所述，章实斋认为：诗话虽然古已有之，但实际上源于钟嵘的《诗品》。古代的诗论分“论诗及事”和“论诗及辞”两种形式。从《诗品》开始到唐朝，诗话并非专门的著述。但是后人却扩大它的范围，将其通于史部的传记、经部的小学 and 子部的杂家。尽管如此，它还是没有超出论事论辞的范围。到了宋代，诗话难以成为专门的著述，只得借用随笔的形式，但又因好名之习而随意撰著，使其流于党同伐异，以至于到了“诗话作而诗亡”的境地。

近来，关于诗话的概念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。郭绍虞在其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（1920）中说：

“论诗风气，何以会如是流行呢？其最大原因，由于诗话之笔记化。唐人论诗，偏重在格，虽无系统可言，然全书总有中心，自与笔记不同。即其专论事的本事者，体固近于小说，然加以分类，也与笔记之冗杂者有别。待到宋人开诗话之体，于是论诗开一方便法门。”^①

① 该书，373页。（台北，文史哲出版社本）

他又说道：

“诗话之称，当始于欧阳修；诗话之体，也创自欧阳修。欧阳氏自题其诗话云：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。他说以资闲谈，便可知其撰述宗旨，本不严肃。司马温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，然记事一也，故敢续书之。所以诗话之体原同随笔一样。”①

在这里，郭绍虞认为“诗话之称，当始于欧阳修；诗话之体，也创自欧阳修”。所以，后人认为《六一诗话》是诗话的源头，而且认为把诗话的定义限定在“诗话”这一名称之中没有道理。因此，罗根泽认为：

“‘诗话’是公名，欧阳修径以名其书。稍后的司马光作续诗话，自序云：‘诗话尚有遗者，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，然记事一也。’所说的诗话，明指欧阳修书，足证欧阳修作是最早一部，司马光所作是第二部。”②

日本的船津富彦在论述诗话的定义时，也列举了许彦周、郑虎文、吴騫、沈琳惠等人的见解。在结束语中，他说了这样一段话：

“广义的诗话，包括所有关于诗文的记录，而狭义的诗话，则只有“诗话”这样一个单一的名称，主要以关于诗的随笔为主体，是从几种说话中形成的。”③

① 郭绍虞：《宋诗话辑佚》，1978年7月改正序。

② 罗根泽：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第6篇，349页。（学海出版社）

③ 船津富彦：《中国的诗话》。

船津富彦把诗话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，他在论述诗话的起源时，只采用了狭义的含义。

可是，我们在查阅诗话书籍时不难发现：有不少诗话书并没有取名为“诗话”，而且有相当数量的论述诗法、诗格的诗话书籍也未采用随笔的体裁。与古代人注重诗话概念的广义性相比，现在，人们一般不考虑其内容的广狭之分，只以名称和随笔体作为区分诗话的标准。

但是，严格说来，诗话并不单纯是一种随笔，而是一种诗评，它是所有诗评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在研究古典诗论时，不应只限定在“诗话”的名称和随笔体的形式范围内，而应把所谓的“诗谈、诗议、诗话、诗评、诗论、诗品、诗说、诗训、诗史、诗则、诗法、诗范、诗规、诗格”乃至“诗解、诗句图”等等，都作为研究对象。显而易见，诗话的定义不应只拘泥于一种形式，更不应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名称。为此，古代评论，即“诗话”的定义也应采用广义的含义。^①

四、韩国诗话的特性

如前所述，笔者曾在一部分文章中，对韩国诗话的特性做过一些阐述。我在编《韩国诗话丛编》^②一书时，曾在前言部分写了一篇兼作解题的文章《韩国诗话资料考》，特地论述了韩国诗话资料的特性。实际上，韩国诗话的特性，可以分为资料的特色和内容的特色这两个方面。下面，分别予以论述。

（一）资料的特性

笔者认为，韩国诗话资料的特性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点：

第一，韩国的诗话正如章实斋所言，由于在论诗中过多地论辞

① 拙著：《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》，《诗话的定义》条。

② 全十二册，（东西文化院刊，1989·1。）

和论事,所以;与其说是诗话书籍,倒不如说是杂著更准确一些。相比之下,李朝后期整理的诗话,比李朝前期以前的诗话少了许多杂著的因素。有些虽然取名为“诗话”,却不是在论诗,而仅仅是谈事。相反,有些书虽然名为漫录、琐说、笔记、小说等,可是书中却有不少严肃的诗评。由于韩国诗话的这种状况源于中国,所以似乎不是什么特性。可是,中国汇编的诗话,由于多方面的原因,在专门的著述中,上述特点表现得更多一些。

第二,韩国的诗话资料中,类似的异本很多。当然,经过校勘以后刊行的版本不在此列。但是,以手抄本的形式传写下来的诗话,自然会出现谬误和一些异本。《小华诗评》(洪万宗)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。有一种藏本说:

“玄默子洪万宗于海著”^①

另一种藏本上则说:

东崖金震标 栢谷金得臣
晚洲洪锡箕 宗文洪柱世

纂辑^②

这不是内容的不同,而是纂著者本人的做法造成的。

谬误和异本多,并不能算作是诗话的特色。在从抄本到抄本的移写过程中,由于抄写者任意改变原书的顺序,有的还去头切尾、部分删除,有的甚至在原书的基础上进行改写,所以,自然会出现许多异本和谬误。当然,其间必然也反映了抄写者自己的志趣和眼光。如此说来,韩国诗话包含有抄写者的取舍选择,这也是它的一大特色。

^① 通文馆李谦鲁氏藏本。

^② 渊民李家源教授,罗孙金东旭教授等所藏本。